

賀楊建利重獲自由

亞衣

4月26日晚間，我在波士頓家中撥通了到北京電話。電話的另一頭傳來了楊建利熟悉的聲音，聽上去似乎中氣很足，精神也不錯。這是北京時間4月27日上午，莫少平律師與楊建利的哥哥、姐姐一起前往北京市第二監獄，將5年刑滿的建利接了出來，此時大家正在飯店裏吃飯。多年沒有聽到建利的聲音了，我一時不知道說什麼好。我向建利轉達了朋友們對他的問候和祝賀，請他多多保重。建利讓我告訴海外的朋友們：感謝這麼多年來所有朋友對他的關心和幫助；現在情況一切正常，從出獄到日後準備回山東老家的安排都正常，從這裏看到了希望；現在的他要處理的全部事情是回家鄉為父親掃墓以及與國內的親人們團聚。說的時候還1、2、3點的，表達得特別道地。我猜想“看到了希望”大概是指還比較順利吧，就說在美國的朋友們準備好好歡迎他回來。建利說回美國的日子現在難以定下，一旦確定，他會馬上通知朋友們。我知道建利生來耿直，怕他遇到不順心的事情會發火，就請他在任何情況下都千萬不要急躁。建利回答說，5年牢坐下來了，脾氣大有長進，請朋友們一切放心。我也真的舒了一口氣，連忙將這個消息告訴了朋友們，包括《世界日報》記者曾慧燕女士。

現在，建利已經了却了為父親掃墓，與鄉親團聚的心願，準備早日回到美國家中。他正在申請護照（原有護照已經過期），取得簽證，然後返回美國。

讀書人

楊建利是我1989年來到美國之後首先結識的好友之一。大家比較談得攏，也許與各自的經歷有關。在我的眼中，建利是一個讀書人。建利1963年出生於山東蒼山縣。1978考入聊城師範學院數學系，1982畢業，獲學士學位；同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研

究生院，攻讀數學碩士學位，1985研究生畢業獲數學碩士學位，留校任教；1986年來到美國進入加州大學聖克魯斯學院攻讀博士學位，1987年轉至柏克萊學院。記得1990年夏天在紐約長島的一次聚會上建利與我說起，他想全力以赴從事民運，又想繼續讀學位。我的意見是無論如何要把書唸完，將學位拿到。果然，1991年他就獲得了數學博士學位。之後受聘任教於金門大學和太平洋大學。我原先沒有想到的是，建利1992年又進入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就讀政治經濟與政府學，直到2001取得第二個博士學位。順便說一下，多年前我曾經着手編輯一本《海外民運百人詞典》，稍作統計，其中將近一半人是具有碩士、博士學位的。這個結果曾經令一些人驚訝，我也嘗試過將這100人與中共中央委員前100人做一個比較研究，遺憾的是沒有完成這一工作。我絕對不會僅以學位高低取人，祇是瞭解在學位後面包含着多少聰明、才智與辛苦，以及一個國家政府領導層文化水平與領導能力的關聯。我不知道像楊建利這樣擁有橫越文理兩科雙博士學位者在海外民運隊伍中還有沒有第二個。就這一點來說，我非常尊重他。

“選舉迷”

人們可以從多種角度闡說民主政體，要是說沒有選舉就沒有民主，大致不會有爭議。稱楊建利是“選舉迷”可能有些過分，但是他對選舉的參與感歷來真的非常強烈，這也許是他深深體察到選舉在民主制度中的重要意義之後的積極行為，也許是他對中國未來民主政治的發展真的具有“野心”（ambition）。楊建利第一次參與競選是在1988年。當時國家教委要挑30個留學生回國訪問，楊建利通過競選被選上了，原先內定的一些知名度高的人却落選了。儘管最終建

利沒能作為代表回國，但這一出乎意料的事件卻引起了國家教委的警覺。1989年民主中國陣綫在巴黎舉行成立大會，民陣主席副主席的競選者有兩對：一對是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祺和原北京師範大學學生、首都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主席吾爾開希，另外一對就是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全美學自聯）的籌建者、中國民主團結同盟（民聯）成員以及民陣美西聯絡員楊建利和學自聯的另一位籌建者，斯坦福大學中國學生會主席許思可博士。1993年1月在民聯、民陣合並大會上楊建利又出來競選，當選為新組織中國民主聯合陣綫副主席。1998年楊建利在接受安琪採訪的時候有一段對話：“安琪：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以後，你會不會參與競選？楊建利：我希望能夠有競選的機會。”我相信這一點。

64情結

嚴家祺先生關於將“89民運”和“64鎮壓”區分開來的說法是正確的。海外有大量投身於中國民主運動的佼佼者，但很多人在1989年大規模民主運動期間主要是隔洋喊話，沒有回國直接參與這次運動；在國內大批以不同角色參與1989年民主運動的人員中，很多人又沒有經歷64鎮壓；有些人在比較早的時候就拿着預先準備好的護照簽證“轉進”出國了。因此在今日海外民主運動隊伍之中，既參加過89民運，又經歷過64事件的人微乎其微，楊建利是這個微乎其微隊伍中的一員。從國外特意返回國內參與89民運的人員，比較著名的是劉曉波。不管人們對劉曉波有多少褒貶不一的評價，我始終對他當年的這個行為抱有尊敬。楊建利是在1989年5月25日從美國回到北京的，直到6月7日在“一派逃亡景象”的北京國際機場登機回美。在美國期間，楊建利曾經參與組織了舊金山灣區數次大遊行，聲援北京學運。回到北京，建利又參加了528大遊行，與母校北師大的同學一起喝酒唱“國際歌”。6月4日他到長安街、天安門，深夜再次來到廣場。看到了大兵、坦克、機槍，催淚彈，軍車在燃燒；滿臉是血的女孩，緩緩倒下的中彈者，被壓扁的屍體，衝上前去收屍的市民……。這是改變一個人命運的經歷。64對他的打擊重大，以至於他每到64就想哭。他認為中國人需要64情結，這就是看了殺人會痛苦，無論用什麼方式

殺人你都要痛苦，然後就是在中國結束這種行為。楊建利是20歲那年加入共產黨的，他回憶當時胡耀邦、方勵之號召青年知識分子入黨改造黨，自己對黨也抱有幻想。經過89，經過64，他對入黨的這段經歷非常自責，因為“客觀上畢竟是在幫中共專制的忙”。說實話，我很少聽到往日的共產黨員的這種自責。

非暴力

要說楊建利的主要政治思想，就是他的一本書的書名：《非暴力抗爭與憲政改革》。非暴力是他的一貫立場，他認為中國有兩種前景最可怕，一種是共產專制的繼續或加劇，一種是暴民專代替共產專制；他主張“良性循環”的原則，包括寬容、妥協、保護少數精神和愛的原則。我想這並非祇與他1991年受洗為基督教徒有關。他寫過不少說明非暴力原則與非暴力抗爭的文字，也與我們的朋友項小吉有幾次公開的著名辯論。學自聯在最近關於楊建利出獄的聲明中還稱他是“中國非暴力運動的倡導者”，認為事實證明“楊建利所致力之民主，憲政，非暴力運動對於當代中國社會和平轉型的極端重要性和迫切性。”我贊同建利關於非暴力的政治立場，也因此對5年前建利的“闖關”回國行為至今有所不解。我瞭解建利思鄉心切，堅決認為中國政府禁止公民返回家園的行為非法而不人道。多年來建利因為積極參與推動中國民主運動，被中共當局列為拒絕入境的黑名單，1996、1999年他兩次申請返回中國都被拒絕；在他的中國護照過期之後，中國駐美使領館拒絕發放有效新護照。2002年4月27日建利在雲南昆明被扣，公開的說法是建利使用他人證件冒險回國，其後中共當局以“非法入境罪”和“間諜罪”的罪名判處他5年徒刑。我對中共當局按的罪名歷來不相信，並不認為使用假證件就是暴力行為，但是，我總覺得5年前建利的行動與他歷來的理念和行為方式在邏輯上是不洽的，而且代價如此之大，實在有點可惜。將來見面，我一定會問他一個明白，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維權先行者

我深信建利5年前回國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國內的工人維權運動。2002年3月在北京召開兩會期間，

遼陽市爆發了大規模工潮，以遼陽鐵合金廠工人為核心，10多家工廠3萬名工人參加游行示威活動，持續9天，舉世矚目。遼陽市公安局以“非法集會游行示威罪”將工人領袖姚福信等人行政拘留（後來又以“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判處工運領袖姚福信有期徒刑7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時至今日，“維權”一詞在中國已經家喻戶曉。而5年前的建利敏銳地看出了工人維權運動對中國民主化的深遠意義，於是遂有回國之舉。楊建利在當年審判的法庭的最後陳述中就專門提到，他這次回國的動因之一，就是實地瞭解姚福星以及其他失業工人爭取自己合法權益的活動。在這一點上，建利可被稱為是先知先覺者，也是一個先行者。有意思的是，當建利作為一個服刑犯人在監獄中的時候，還寫了不少文章和公開信，用親身經歷指出中共司法系統在審訊、聽證、辯護過程中對犯罪嫌疑人權利的粗暴剝奪，監獄系統在服刑過程中對犯人基本權利的非法侵害。2005年12月10日建利專門寫信致北京市監獄管理局負責人，就監獄服刑人員每月採購日用品、副食品所承受的不合理價格，服刑人員的公平交易權受到侵害問題反映情況，依據國家有關法律賦予的權利提出幾項要求。很有意味的是，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建利又提出了中國的“納稅人”概念以及中國需要一場“納稅人革命”的問題。這些思考都是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的。

孝子和慈父

表面張牙舞爪並非英雄；時時口出善言，在強權面前似鋼似鐵，纔是好漢。建利脾氣很倔，有時真是倔得可以。當年法庭判決他5年徒刑，他決定不上訴，理由是當局不講法，他們之間是一種“極不公平的遊戲”，於是“不跟你們玩了”。律師勸他不聽，家人求他無效。可是，你說不跟他們玩了，在監獄的5年，不還是要和他們不公平地玩？去年9月，當局提前釋放楊建利。建利提出小小要求：回美國前先回山東老家為父親掃墓。祇因在坐牢期間，建利90多歲的父親從美國回中國營救兒子，不幸在山東老家病故；建利為此終身抱憾。可是這極其正當的人道要求卻遭到當局拒絕，於是建利寧可重返監獄，繼續被關押直至刑滿。這次出獄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山東了卻這件心

願。建利兄弟姐妹共9人，他排行最小。建利喜歡小孩，有一女兒14歲，一兒子11歲。看看他在獄中給兒子寫的信，真是令人心碎。這次出獄之後，兒女幾乎與他天天通電話。兒子想買個吉他，也要問問爸爸是否同意，爸爸回答等他回來就帶他去買。

不能不提傅湘

說到這裡，不能不提建利的妻子傅湘。記得2004年的聖誕之夜，我與妻子帶了一點小禮物前往建利在波士頓的家中探望，祇見傅湘忙裏忙外，又要準備晚餐，又要照顧兒子的家庭功課。看着這個缺少男主人的家庭，不由一陣心酸。我的妻子歷來對民運圈內的是非風雨不聞不問不知，離開楊家卻一直唏噓不已，她敬重建利夫婦，為建利失去5年青春萬分惋惜。傅湘1978年進入北京師範大學數學係，1982年畢業獲得學士學位，後讀研究生繼續攻讀碩士學位，在此期間認識楊建利，兩人是同一導師。1985年傅湘取得碩士學位，與建利結婚後到美國，在加州大學聖塔克魯斯學院數學係，1991年與建利一起拿到數學博士學位，1993年到哈佛大學醫學院工作至今。這5年間，我曾經多次為傅湘起草或者修改給中國黨政領導人的求援信，無非是希望楊建利早日回家團聚，讓妻子見到丈夫，兒女見到父親。可是從江主席到胡主席，求情文字換來的都是鐵石心腸。有時與傅湘通電話，我說“幾乎每次都能聽到你的笑聲”。她說，“咳，怎麼辦？總不能天天哭呀”。看看建利2003年7月在給兒子的信中是怎樣描述兒子的媽媽的吧：“她大方的儀態，她的良慧、堅強和大度是女性中少有的。還記得昨天的會見嗎？從始至終，媽媽都微笑著，雖然眼裏噙著淚，卻還是堅強地微笑著。”

在結束這篇短文的時候，我為文章標題考慮再三：是“賀”建利重獲自由，還是“盼”建利重獲自由？就建利離開監獄成為不受監管的中國公民來說，我應當祝賀他獲得自由；就他還沒有及時回到美國與妻子兒女團聚來說，我還在盼望他獲得自由。我盼望建利不日內順利拿到護照，取得簽證，登機返美；我盼望早日在哈佛附近的那家中餐館為建利接風洗塵，在大紐約為建利做英雄式的歡迎，在夜深人靜之時，繼續我們早就約定的長談。◆